

从佛经与《圣经》翻译看中西方翻译思想 ——《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评析

顾颖

(常熟理工学院外语系,江苏常熟 215500)

摘要:勒菲弗尔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提出西方译者更为忠实原文,而中国译者更倾向于归化原文的观点是片面的,佛经与《圣经》翻译思想发展有其一致之处:直译、意译两原则交替主导翻译活动并趋于成熟,直至最终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佛经翻译;《圣经》翻译;中西方翻译思想;直译;意译

中图分类号: G62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94(2008)03-0122-03

一、勒菲弗尔的主要观点

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是当代文学翻译领域一流的学术带头人,同时也是“翻译研究”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他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1]一文中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对以佛经为代表的中国翻译思想和以《圣经》为代表的西方翻译思想作了一个比较,认为中西方的翻译思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译者更为忠实原文,而中国翻译就比较自由,对原文不够尊重(faithfulness/freedom)。由于勒菲弗尔本人对中国文化和翻译思想的了解主要来自他的一个中国学生的博士论文,同时也由于他对中国翻译史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对中国翻译思想和翻译历史的认识难免有些偏颇之处。勒菲弗尔认为初期的佛经翻译,由于译者如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等一方面不熟悉汉语,另一方面经验不足,语言学知识贫乏,因而比较偏向于直译。此外,在佛经翻译中采用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译经僧侣对佛教经典抱有虔敬态度。因此,高士安的翻译有时为了顺从原文结

构,不免重复颠倒,对于某些术语的翻译也欠精确,令人费解。到了三国时期,“支谦和康僧会主张译文中减少胡语成分(即音译),不死扣原文,注重译作的词藻文雅,在文字质量上确实提高了,但却产生另一个偏向,就是删削较多,文简而不能尽表原意。”^{[2]28}所以勒菲弗尔认为从此时起,佛经翻译就被“适合文学创作的雅(elegance)的风格”所代替。^{[3]22-23}并且在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谈到佛经翻译策略,勒菲弗尔认为,从支谦开始,中国的佛经译者就一直使用老子的概念来翻译佛教概念,具体一点说,是用道教的概念来替代(replace)和归化(acculturate)佛教的概念。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在佛经翻译初期,译经者往往喜欢用老、庄、儒的经典来翻译佛经的名词和概念。但是注意这是在佛经翻译初期出现的现象。随着佛经翻译的进步,研究的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2]124}正因为如此,佛经翻译才为汉语输入了大量佛教词汇。可见,所谓使用老子的道教术语来翻译佛经,是在佛经翻译初期、支谦以前的做法。在支谦之后,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弊端,纷纷把精力放到佛教用语的创立方面。

收稿日期: 2008-01-18

作者简介: 顾颖(1981—),女,江苏常熟人,常熟理工学院外语系助教,硕士。

二、勒菲弗尔观点中的不足之处

正如勒菲弗尔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一文开头所写,他对于西方翻译思想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中方翻译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他对中国翻译思想特别是佛经翻译了解不是很透彻,因此笔者认为他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略有不足之处。

1. “文”与“质”

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质”与“文”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文”与“辞采”,即修饰译文,使之通达;“质”指“朴质”,即紧扣原文,不增不减。“文”与“质”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意译”与“直译”。从公元2世纪开始,中国开始佛经翻译,从此,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最初的佛经翻译通常这样进行:首先由来自西域或印度的僧人用胡语或梵语口授,另一人译成汉语,记录后再做润饰。所以当时的佛经翻译多文字质朴,力求保存原本面目,也就是说早期翻译中“质”处于主要地位,译者恪守原文,将梵语直接变为汉语,不作任何改动,甚至还采用音译的方法,译文多晦涩难懂,安世高的译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三国时期以支谦为代表的翻译家则从“质”转向了“文”,力求译文“辞旨文雅”。严复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这三项标准其实师承道安有关“文”与“质”的概念。“文”即“古雅流畅”,也就是“达、雅”;“质”即“忠实原旨”,亦指“信”。

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勒菲弗尔在不了解某些汉字(拼音)意思的情况下导致了对某些术语的混淆。例如在谈到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时,就将“文”说成了“质”,“质”说成了“文”:

Of course the first translations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into Chinese were done in what was referred to as a ‘simple’ style, or wen, but mainly because...

After Zhi Qian, translations were done in the elegant style, or zhi, suitable for literary production, no doubt because the translators realized that was the only style that would be taken seriously by the target audience of officials, literati, and intellectuals. [1]21

从‘simple’ style 一语可以看出,第一句中的“wen”显然不是指“文”,而是“质”,而第二句中的“the elegant style”“zhi”也不是指“质”,而是“文”。

从我国翻译史上看,佛经翻译初期是以“质”为

主的。到支谦时期,译文才开始转向“文”。其实勒菲弗尔所要表达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搞清楚“质”与“文”的意思,完全颠倒了两者。

2. 佛经翻译与中国翻译思想

佛经翻译历史悠久,其译者之众,译经数量之多在世界翻译史上可谓史无前例。期间翻译大师辈出,如汉桓帝时的安世高、三国的支谦、晋代的道安、符秦时代的鸠摩罗什、隋朝的彦琮和唐朝的玄奘等。

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质”与“文”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在上一点中已做解释,在此就不赘述了);三国时期以支谦为代表的翻译家则从“质”转向了“文”,力求译文“辞旨文雅”。他们迎合当时统治阶级崇尚华丽词藻、喜好神仙方术的口味,把道家的玄学思想揉合到翻译中去,行文中讲究文丽简略,这种过分追求美巧的意译,势必使译文偏离原文,因而遭到后来翻译家们的激烈反对;到了东晋,直译派的代表人物道安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五失本”(翻译中有五种情况可以容许译文不同于原文)、“三不易”(译事有“难得恰当、难得契合、难得正确”三难)的原则,表明道安已经看到并试图缩小梵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别,不再把“文”与“质”当作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道安之后的鸠摩罗什开创了佛经意译的新风,译出的经文典丽而又不失原意,他的译文被称之为“新译”,很受当时读者的欢迎;唐朝是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顶峰,主译者多为精通梵语、汉语和佛学的本国僧人,所译佛经在忠实于原著和文采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译经大师玄奘在鸠摩罗什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突破。他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了“五不翻”(译文有五种情况不宜意译而宜音译)的翻译原则。玄奘的“五不翻”较之道安的“五失本”有了一定的进步,与鸠摩罗什的新译相比也有一定的提高,他的实质是将意译与直译融为一体,使译文达到了“意译直译,圆满调和”的效果。

由佛经翻译历程可以看出佛经翻译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幼稚的直译到幼稚的意译,又由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并最终实现直译、意译的有机结合”^{[6]45}。因此笔者认为,勒菲弗尔对于中国佛经翻译倾向于归化原文的观点是片面的。

3. 《圣经》翻译与西方翻译思想

在宗教势力强大的西方,《圣经》翻译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初期的《圣经》翻译存在“重词句、轻神理”^[4]的倾向,译者完全按照字面直译,译者虽然费苦

心,译文却不堪卒读,《七十子希腊文本》是这类直译的典型,其中有些章节逐字死译,文本生硬,语言拙劣之极。公元405年前后,哲罗姆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使拉丁语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哲罗姆认为各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及语义、内容等方面都互相区别,因此不能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他承认自己在翻译中“有时意译,有时直译”。哲罗姆的翻译思想对中世纪西方各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古代后期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的“译者受上帝感召”说和逐字直译的观点。中世纪早期,英国翻译家阿尔弗里克(Aelfric)提出了翻译《圣经》时拉丁习语必须让位于英语习语的原则,他在翻译中多用意译少用逐字对译,目的是使译文“简明易懂”。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推动了翻译活动的巨大发展,成为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圣经》翻译家,他适应时代的需要,采用人民大众的语言译出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民众的圣经”^[5],路德认为不同语言之间是无法逐字对译的,他的翻译采用意译,以实现让读者完全看懂译文的目的。

为了平息圣公会(英国教会)和清教徒关于《圣经》权威版本的争议,公元1640年詹姆士一世指定学者翻译一种统一的、各派均能接受的版本。该译本于公元1611年出版,定名为“钦定本圣经”,译文比较忠实于原文,学术价值也高于前人译作,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杰作之一,对标准英语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钦定本圣经”是《圣经》翻译史上融直译、意译为一体的一部佳作。

笔者认为由《圣经》翻译历程可看出,《圣经》翻译思想的发展如同佛经翻译一样经历了“从幼稚直译到幼稚意译,由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并最终实现直译、意译的有机结合”^[6]⁴⁵。因此支谦等佛经译者采用的归化策略并不是中国专利,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归化或“雅”就是中国的翻译传统。

三、结 论

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是中西方历史上两项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勒菲弗尔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关于西方译者更为忠实原文,而中国译者则倾向于归化原文的观点是片面的。佛经与《圣经》翻译思想发展的共有规律是:直译、意译两原则交替主导翻译活动并趋于成熟,直至最终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 [1] Lefebvre, Andre.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M]//Bassett, Susan, Andre Lefebv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Cleve 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 [2]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 [3] Bassett, Susan, Andre Lefebvre. *Constructin Cultures* [M]. Cleve 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 [4]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89.
- [5] 柯平.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135.
- [6] 王克非. 文化翻译史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Observ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and the Bible:

A Review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GU Ying

(Foreign Language Dept., Changshu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Andre Lefebvre's idea that Western translators being faithful to original texts, while Chinese translators tending to acculturate original tests is one-sided. There are some common points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and that of the Bibl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alternately dominates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us they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maturity until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wo principles' integr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